

静|一|述|林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论丛 之十
总主编 傅勇林

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

明清之际（1644—1683）江南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

高岚◎著

本书由“西南交通大学2009年度
发展潜力学科项目”资助出版

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

明清之际（1644-1683）江南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

ISBN 978-7-5411-3047-2



定价：30.00元

静 | 一 | 述 | 林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论丛 之十
总主编 傅勇林

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

明清之际（1644—1683）江南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

高岚◎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 明清之际 (1644—1683) 江南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高岚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411-3047-2

I. ①从… II. ①高…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3424 号

Cong Minzu Ji yi Dao Guojia Xushi

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

Mingqingzhi ji (1644—1683) Jiangnan Hanzu Wenshi De Wenxue Shuxie

明清之际 (1644—1683) 江南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

高 岚 著

责任编辑 张春晓 (zcxiao008@163.com)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龙小龙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69.8 千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047-2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总序

傅勇林

荀子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荀子·解蔽篇》）“虚”，然后“一”，然后“静”，然后而知“道”。本丛书名《静一述林》，取其深意也。

王国维曾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学与思皆应从“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三个角度出发，追求“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境界”。但“境界”是一种深度创构，是“本”，“天怀意境之合，笔墨气韵之微”，“放之可弥六合”，而后可以求“道”知“道”，故应将其作为理想的学术追求，“持之以恒古今之作者”。本丛书体现了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全体同仁如是学术旨趣——静虑澄心，“虚怀若谷，静一至道”。于学科建设而言，此为根本，当有深意焉。

“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全体同仁恪尽职守，教书育人，同时“皓首穷经”，不断提升理论素养，拓展学术境界，提高专业能力。我们高悬起“学术境界”这把标尺作为理想的目标去衡量、读解与阐释外语教学生动的现实实践，试图以求“道”之旨“月印万川”，鉴照理论与教学实际，使其呈现“有我之境”。丛书的核心理论追求就是“求道”，并将其悬为映照万川之“月”，作为价值尺度，以求“学理”。有鉴于此，丛书各位作者在丰厚的实践层面中梳理甄别，洞幽察微，同时以各种理论资源作为鉴照，拈出其中之要旨并移入当下之研究，遂在传统研究模式之中注入深切之内涵，“所见者真，所知者深”，所论“豁人耳目”，可见出笔墨“境界”，“理趣渐成”。

但是，“所知”因有“所见”，而“所见”当取定“立场”，首先解决“身之所容”，于是方有“目之所瞩”，从某一特定视角入手畅神而游，虽然“境界因地成形，移步换影，千奇万状”，“但游目骋怀，必是方得深景真意”。“意之所游”指“目力虽穷而意脉不断处是也”，这样“眼光收处，不在全图”，“合

景色于草昧之中，味之无尽；擅风光于掩映之际，览而愈新”，“真境逼而神境生”，遂“境界全出矣”。但是，在“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内涵之中，前两者只是前提，“境深”才是关键，因为它强调境界的深层创构，认为学术境界并不是学术与教学实践单向度的经验再现。可以说，“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内涵以及“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三个层面不管“学术境界”的生成机制，也是外语学科对其教学实践活动进行创造性重组的逻辑出发点。知识与实践单元的重组为知识纤维（命题、规律、原理）的抽取提供了条件，也是理论系统化的必然。外语学科建设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凿壁借光，以新的视野对各种理论与实践命题进行学术肌理上的知识注入，而后实施理论反思与创造性升华。升华后的知识与实践单元理论清晰度大大提高，也为外语学科理论的推演提供了学理基础。由于这些理论命题是在提取了相关的知识与实践单元以后所升华而成的，反映了其间的内在联系，所以应将其悬为外语学科建设一种普遍的学术追求。如王国维所说：“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故此，本丛书据于“境真、境实”，追求“境深”和“境界”，此为“学理”，亦是学术“理据”，我们正在“路上”，自当深长思之。

升华学术与教学实践，“入门要正，立意要高”，当“通大义，识大体，立根本”。外语学者或教师应学贯中西，“灵根自殖”，因为“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浅”，需如清戴震所言，追求“精审，识断，明辨，淹博”。“真力不至则精识不生”，然“学充则文至”，“学充”要求中外学养统摄，本土域外新知融合，要呈“自足圆融”之象，博洽周流，左右逢源，“更行更远更生”。学术“非真积力久，亲证而后得”，据此而与他人共勉。是为序。

傅勇林

傅勇林，文学博士，教授，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帝国轮替中的认同演变

——为高岚新著而作

徐新建

高岚的博士论文《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将以专著形式出版，特表祝贺。近年来，在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我指导）的研究生团队中，有不少选择以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和文化个案为题来作为学位论文撰写。此前有梁昭的《刘三姐表述》、王菊的《彝学演变》以及张中奎的清代《苗疆再造》和李菲的嘉绒《跳锅庄》变迁等等^①，都从各自选定的角度出发，相继讨论了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在不同地域及历史阶段里的民族关联。

高岚著作以“明清之际江南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为副题，关注由明入清的历史变局，时间锁定在1644—1683年间，力图辨析满族入关并掌握政权后江南汉族文士在民族身份和王朝认同上的文化纠葛，这是十分重大的历史和学术问题。

在我看来，研讨、还原或重构中国的历史，须注意几个关键，一是华夷互补和帝国轮替，一是“史前史”与“史外史”。历史有绝对和相对之分，绝对的历史一去不回，相对的历史则是被后人复述的故事。与绝对的“事本”或“事本史”相对，后者可谓广义的“话本”或“话本史”。对于东亚大陆的夷夏

^① 此处提及的梁昭等论文已有部分作为专著面世，如王菊的《从“他者叙述”到“自我建构”：彝学研究的历史转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它们与高岚的新著一道，可视为从文学人类学视角对多民族国家的族群关系及文化传统加以论说的一个系列。

境况而言，匡进汉语“话本史”里的故事不过数千年；在其以前，“事本史”的历程则须以万年来记。其间的丰富原形，充其量也只在“考古史”里得到碎片式的些许还原。因此当我们言说“中国历史”，其实只是在仅就纵贯数千年的话本故事发论。这是需要提醒注意的。

至于如何经由这绵延数千年的“话本史”进入对与之联系的“事本史”的关注和研讨，有上下两个“三代”值得对照言说，即通常被视为国史开头的夏、商、周和接近收尾的元、明、清。但是，论说王朝起始的“前三代”，要注意的是它们在空间上的差异并置，而非被后人夸大的代际关联——这说法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依照前人“夷夏东西说”的揭示而作的引申和强调。^①与此不同，论说“后三代”则应关注由不同族群、地域乃至文明主体所承载的帝国轮替。照此而论，高著所论的明清“之际”，便正好处在又一个重大的轮替时期。其间的时代和社会变局，自然充满了值得从多方面书写的丰富意含。

《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把焦点对准江南文人的认同变异，讨论的其实是新帝国内“汉与非汉”的关系转型。对于这样的转型，照惯常的中原汉文化本位说法，难听一点叫“五胡乱华”、“蛮夷入侵”，好听一点称“异族入主（中原）”。这种可视为“华夏情结”的历史心性，既呈现在身处其境的历史当事人之言行举止及与之关联的特定事件和历史过程中，也不断重现于后世回顾者予以认可的历史表述里。然而，对于新帝国内“汉与非汉”的族群互动和关联，这样的心境和表述都是单一而残缺的。高岚的论述有一个可贵之处，那就是其虽以江南汉族文士为聚焦，却能同时关注作为帝国掌控者的满人视界，从而体现出族群对等的复线叙事。比如在论述雍正时期轰动朝野的“曾静案”时，高著就在描叙吕留良等中原汉人对华夏本位之固守的同时，对照阐释了皇帝雍正以《大义觉迷录》为书对满洲族源及其与华夏关联和延伸的言及行。这样的视野和努力，或许能使我们绕过单族叙事的围墙，重现被汉学成见遮蔽了的“史外史”。高岚通过此案例力图说明的是，在明与清的帝国轮替之际，汉、满两族对各自民族身份的强调以及弥漫于彼此间十分浓厚的“他者意识”。她客观而清醒地从两面评说道：

^① 史学家傅斯年最早在1930年代提出“夷夏东西说”，认为夏、商、周代表不同的地域文化体系，夷和商属东系，夏和周为西系。参见傅斯年著《民族语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考古学家张光直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进一步强调古代中国的多元起源论。参见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作为与清廷不合作的代表，企图恢复民族主权的民间汉族知识分子，王朝效忠的背叛者，曾静等人在此案件中的态度颇值得注意。同样，作为官方的最高统治者和满族的精神领袖，雍正皇帝处理此案的手段也具有重大意义。他们之间所展开的，是一场文化和认同的争夺战。^①

尽管其对作为帝国统领的满族主体在其自身定位和文化取向等方面都远远不够，但在我看来，高著对于清帝国内部的民族文化论述，能够做到上述那样的双向视野和复线叙事已属不易。结合“曾静案”所关涉的文化背景，在被江南士人攻击的满族统治者一方，其最为关注的问题有二，用雍正钦定的《大义觉迷录》所作的表述来说，即为：

其一，满人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

其二，到底是“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呢，还是“天下一家，万物同源”？^②

此两大问题一个涉及政治正统，一个关系民族分别。雍正以问句质疑，其实已表明对答案的判定。对于前者，自然是不应再以华夷和中外相分；对后者，则当以“天下一家”和“万物同源”的民族对等观取代“一点四方”^③的华夏中心论。依据《大义觉迷录》的记载，面对犯案在押的曾静，雍正以逼问和自答的方式阐发道：

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盖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④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清王朝是否真正做到了民族对等还可深究，雍正此言对以往“汉族入主”之帝国模式的文化修订当值得注意。高岚的书仅写及清初，而待历史演变到清中以后，亦即到了清王朝的强盛时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那样的汉族权贵非但不再像吕留良和曾静那样以华夷之别为由而谋变，反倒自觉地以天朝忠臣身份报效帝国，担当起承继往圣的治国平天下重任。这样的转变，除了帝国政治惯有和沿用的集权高压与科举取士

① 参见高著第五章“曾静案与《大义觉迷录》”。

② 参见（清）雍正皇帝编纂《大义觉迷录》（张万钧、薛予生编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

③ 有关“一点四方”的论述可参见笔者的《西南研究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④ 参见（清）雍正皇帝编纂《大义觉迷录》（张万钧、薛予生编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

等缘由外，汉族官僚由起初“满汉相分”向后期“君臣关联”的认同转变，无疑是另一需要认真看待的重要动因。

话说回来，对上述问题进行研讨，无论历史、民族还是政治，进入的角度无疑很多。出于学科选择（或曰限制）的原因，高岚突出了“民族记忆”和“国家叙事”。这一点从大处说，称得上文学人类学的专业特色；从小处论则与我本人对表述问题的强调有关。作为学人，我近来不断发表与此相关的论述来加以倡导和促成；作为导师，则希望弟子能对此予以提升和推进。像此前的学长们一样，高岚以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的认同变迁为案例所做的研讨，可以说已体现出在此论域中的最新思考和前沿成绩。

于我而言，此可谓探索不断，薪火相继，怎不令人感到欣喜和慰藉？故而虽以为其作用高标准看还开掘不深，文笔稚嫩，然从取材立意到篇章铺陈又都堪称流畅严谨、独具用心。由是，笔者乐意写下此篇短文，奉以为序。

2010年谷雨日，记于筑城

「目 录

总 序	傅勇林 001
帝国轮替中的认同演变	
——为高岚新著而作	徐建新 001
绪 论	001
第一节 研究对象	002
第二节 相关研究回顾	027
第三节 研究方法	039
总论 文学的身份问题：1644—1683 的“中国”与“汉族”	041
第一章 江南抗清士人	050
第一节 剃发易衣冠	050
第二节 国难家仇与民族意识	055
第三节 作为民族义士的文化偶像	060
第四节 从民族义士到国家忠臣	066
小 结	072
第二章 自耻的“失节者”	074
第一节 失节者·自耻者·文化遗民	075
第二节 同时代人的评价	085
第三节 变节者与遗民的交往	094

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明清之际（1644—1683）江南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

第四节 清廷建构的“贰臣”	096
小 结	100
第三章 从政治遗民到文化遗民	102
第一节 遗民的集体创伤	105
第二节 故国记忆与悼亡书写	111
第三节 南宋与南明的重叠：民族伤痕与文化记忆	120
第四节 “国史”存亡：从夷夏之防到文化传承	129
小 结	134
第四章 作为清廷新贵的汉族士人	136
第一节 遗民时代的尾声	137
第二节 文化悼亡的余韵	141
第三节 帝国记忆的新篇章	156
小 结	170
第五章 固执的“民族主义者”	172
第一节 吕留良的夷夏论	173
第二节 曾静案与《大义觉迷录》	177
第三节 复线历史与双重线索	182
小 结	185
结语 士人视野中的民族与国家	186
第一节 汉族政策的至关重要	188
第二节 汉族士人：首要控制对象	191
第三节 治统 道统 族统——从“皇汉”认同到“中国”认同	206
参考文献	212
附表一：清廷治汉政策大事年表	226
附表二：江南士林大事记（1644—1683）	236
后 记	242

「绪 论

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进入民族国家的时代，民族研究和族群理论开启了研究国家合法性存在的热潮，中国这一至今存在的古老文明体的传承和现状成为全世界学者关注的焦点。如何定义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中国，怎样解释源远流长的文明共同体“中国”与现代民族国家“中国”之间的传承和过渡，不仅仅是海外汉学家们争锋相对的论战，更是关心本国历史承继和解释国情现状的每一个国内学人的责任。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国际背景下写就的。

中国的民族国家之建立以及民族主义之精神，讨论尤多者是清末民初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但当我们回眸当年，会发现一个诡异的文化现象居然曾经驰骋江湖——“无报不谈明末事”。^①本已成为历史记忆的“晚明”的事件与人物被反复重提，从朝廷议案到报纸杂志，从建祠立庙到戏剧演出，其参与人士之多，表述方式之繁，立场去向之杂，可谓史无前例。上至清王朝，下至市井百姓，更不用提掌控着当时话语权利的知识分子，无人不谈，无人不论，其声势之浩大，使得“晚明想象”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话语盛宴。毋庸置疑，晚明记忆之于晚清社会，之于中国现代性之转变，之于民族国家之成型，在那个微妙时期，都并非只是一个一般的文化问题，而曾经一度是举足轻重的政治问题。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针对“晚明学术”与“晚清政治”

^①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明清之际（1644—1683）江南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

之间不可割裂的因果关系，有过一段斩钉截铁的话：

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潜意识”里头，碰着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①

更有学者直接陈述当时倚重明朝历史记忆而重构汉族中国的意图。王汎森在《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一文中明确提及：

在清末关于中国未来国家建构的论辩中，尤其是“革命与君宪”的论争中，明清易代的历史记忆确实曾经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清末的士人甚至到处印发明太祖的画像，在诗歌中虚拟自己与明王朝子虚乌有的君臣关系，从而在情感层面上突出此种易代变迁的合情合理。而民元之后行省各地昙花一现般为明季遗烈修祠建庙的政治热情，也正是此种“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之间密切关系的最直接说明。^②

因此，为了更好地理清我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进程，追本溯源，基于对研究现状的考察，本书拟将研究的时间段划定为明清之际（1644—1683），将研究对象确定为江南地区汉族文士的民族记忆与国家书写，借此来辨析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嬗变。

第一节 研究对象

一、明清之际

明朝作为元朝和清朝两个非汉族王朝的承上启下者，其汉族成员在传统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对汉族民族身份的理解和强调非常突出。清朝作为中国成为“民族国家”之前的最后一个王朝，并且是非汉族王朝，汉族成员与官方的关系非常微妙；从整体来看，该时期人群的身份认同变化对当前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有相当重要的引导作用。而更重要的是明清鼎革之间，其时隐匿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32—33页。

②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1、72、87页。

着诸多变化和潜伏的因素，汉族成员对民族与王朝国家的认同嬗变过程显得幽微而曲折，但却扮演着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当然，明朝与清朝并非是同一性质的王朝，其政体、疆域、国家机构、国家官僚结构、文化导向都有着极大不同，特别是清朝对于现代中国国家的意义更非明朝可比。但正因如此，这一时期才在族群嬗变的历程中显得尤为特殊和重要——明清易代对于中国人的族群认同而言，就与其他朝代交替不同，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王朝效忠对象的变更或者民族主义的发生，或者不同族群之间的斗争与归顺，而是开始走上了现代国家意义上的身份转变。

本书据此划定研究的所谓“明清之际”的年限范围，从1644年到1683年。1644年，清军入关并定都北京、南明建都南京，开始了明清两大政权的对峙。而1683年，清朝收复郑氏打着恢复明统旗号而割据的台湾，这不仅仅意味着清朝廷在版图上占有了最广大的“中国”地区，更意味着最后一批为郑氏所保护的故明宗室向新的王朝低头称臣，在正统上承认了清朝立国的合法性，也基本斩断了民间光复明朝行为的合法性——从此，清朝可以堂而皇之地将所有反清复明的组织定义为“寇”。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曾经坚持抗争，否认清政权的汉族知识分子群体而言，此四十年亦是一个明显的时间单元。1683年，其思想影响颇广并在身后仍然引起全国性轩然大波的激进汉族“民族主义”分子吕留良去世。此前一年，1682年，汉族知识分子的旗帜性人物顾炎武亦辞世，而与顾炎武齐名的同代遗民大儒黄宗羲、王夫之皆已进入暮年，数年后亦去世。再前推十数年，在明清易代时期活跃的各类跨代汉族文士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方以智、张岱、阎尔梅、陈维崧等都一一辞世，而与此同时，作为清帝国新生代的文士王士禛、孔尚任、曾静等人物又在此段时间成长起来。因此，对于被定性为汉族政权的明朝的故国记忆和“文学书写”终于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

在这四十年间，明朝政权经历了与清政权对峙的福王、桂王、唐王政权；清帝国也经历了顺治、康熙两朝，经历了一个王朝和帝国致力于征服、控制、统一和稳定“中国”地区的艰辛历程，经历了一个统一共同体认同艰难成形的过程。此间，对于“正统”及国家合法性的讨论显得尤为醒目，这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冲突阶段，也是民族身份以及各种族群认同的碰撞时期。而本书将研究重点放在明清之际汉族文士身份认同嬗变的动态历程上，是因为身份认同有着过去也有着未来，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

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明清之际（1644—1683）江南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

当然，由于论述完整性的需要，本书不会仅仅局限在上述四十年的历史时间之内，而还将兼及雍正和乾隆两朝。因为，笔者以为，作为一种动态的认同历程，有其起点也必然有其发展，而雍正和乾隆时期的认同状态姑且可以看做是上述四十年发展变化的一个阶段性结果。

二、江南地区

江南之所以成为本书论述的焦点，是因为自宋元到明清，江南不仅成为经济中心和政治焦点，同时人才辈出，学术文化蓬勃，形成了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浙人文渊薮，已经取代中原成为汉族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时此地域士人的汉族意识也最为优越和明显。

江南的崛起甚至取代中原成为汉族文化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要感谢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每一次大规模的南下，就是一次中原文明向江南的推进。中原文明曾经遭受过游牧民族的多次重创，引起大规模南迁。一次是西晋末年（311）的永嘉之乱，匈奴等游牧民族攻下洛阳，掳走晋怀帝，晋室政权不得不流亡南方，建立东晋。北方士族豪门亦纷纷南迁，进入长江以南，史称“衣冠南渡”。另一次大规模的中原文明南迁是唐天宝十四年（755）的“安史之乱”。还有一次是宋代的“靖康之耻”，金掳走北宋徽、钦二帝，宋室被迫南迁，建都临安（杭州），史称南宋。此次中原文明的大举南迁，规模之大，超过以往各次。三次衣冠南渡，中国的农业中心从北向南转移，文化的中心亦随之南移，造就了江南的经济和人文基础。而每一次汉文明的衣冠南渡，都是对江南的一次开发、拓展和提升，也是对江南这个概念的锤炼。正是在这一次次的锤炼中，江南的形象越来越鲜明。

同前三次南迁一样，明清鼎革之际，南明小朝廷也定都在此，于是江南成为明清正面交锋的主要战场。因此，作为华夏文明最后堡垒的江南失守后，受过传统文化洗礼的汉族知识分子，才如此的难以接受异族文化上的征服。他们不仅把这次鼎革从“亡国”上升到“亡天下”的程度，更为反抗剃发易服而号召各种“义师”。如张采在太仓号召，被奸人行刺后逃亡；刘宗周在杭州号召，不久投水死；侯氏、黄氏兄弟在嘉定起兵；陈子龙、徐孚远、夏允彝、吴易等士子也在江南各地发动义师，以死相搏。而因为这样的抵抗，江南又成为民族矛盾激化的焦点所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屠城，江南一带比比皆是清廷暴力征服的血腥事件，也给江南人士留下深刻的伤痕。这一伤痕一直留存到清末，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最重要的重读文本。

而正由于江南作为汉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清廷对此地的文化控制也不敢有丝毫放松。频发的文字狱、科场案、通海案、哭庙案、奏销案，无数的诏令密旨，历代帝王的数次巡视，在在说明这一地域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和满族统治者心中的微妙情结。但是，在战乱和族群斗争中受过严重创伤的江南，却在乾隆时期再次达到文化鼎盛；作为江南文化赞助者、引导者乃至控制者的清廷慢慢平复了这一地区的伤痕，并建立起新的国家形象。短短百年间，到清中期，原先抵抗最为激烈、遗民人数最多的江南，竟然在文化上再次翻身而跃为“文化中心”的地位，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但是，这一次，江南的地位，不仅仅是汉文化中心，更重要的是成为帝制中国的文化中心。且不说清朝江南进士的数目，这里只以考试“首选”（即状元、榜眼、探花、传胪、会元）的人数为据。根据商衍鎏先生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的《清代殿试、会试历科首选省份人数统计表》，从顺治丙戌（1646）至光绪甲辰（1904）两百多年间，江苏共出状元等184人，浙江共出状元等137人。两省相加的人数为321人，是直隶、顺天、河南三省相加的35人的近十倍。^①在这个数字对比中，背后是经济、文化条件以及高素质的人口质量的对比。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的江南确实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文化中心。在“中国文化中心”这一层级的意义上，江南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诸如水软风轻感伤唯美的地域文化意义，甚至远远超过了与异族针锋相对的汉族文化意义。因此，江南地区成为汉族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嬗变最典型的一个案例。

所谓江南，在古代，往往代表着繁荣发达的文化教育和美丽富庶的水乡景象，区域大致为长江下游南岸的地区。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江南的说法。历史上以“江南”命名的行政区的演化为：唐朝以前，“江南”一词所指区域囊括长江以南以及长江沿岸广大地区，包括荆州（鄂东南、湖南）、扬州（江西、皖南、福建、苏南、上海、浙江）。唐太宗设立江南道，范围包括整个长江中下游长江以南地区，以及贵州、福建等地。唐玄宗把江南道细分为江南东道（福建、苏南、上海、浙江）、江南西道（鄂东南、湖南、江西、皖南）和黔中道。晚唐时期专称江南东道（江东）为江南，从此产生了文化意义上的“江南”概念。后又将江南西道演化为今江西省；而江东地区则以南京市为中心，主要包括苏、浙、皖部分地区。宋朝时设立江南西路（江西大部、鄂东南）、

^① 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生活·图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